

造纸术的社会史

——读《以竹为生：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》

廖 涵

(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, 重庆 400044)

[中图分类号]K26

[文献标识码]E

[文章编号]1000-422x(2017)04-0100-03

明清以来,随着造纸术的革新和传播,从事造纸业的人口不断增多,纸张生产日趋专业化,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区域社会。然而,学界对造纸业的关注,多集中于造纸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形式,鲜有论及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。德国学者艾约博(Jacob Eyferth)的《以竹为生: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》(韩巍译,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6 年出版,以下简称《以竹为生》)一书,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,在梳理档案资料基础上,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,全面地论述了 20 世纪夹江县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史。

一、造纸术与社会秩序

夹江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,出产全国知名的对方纸、连史纸和贡川纸,是西南地区纸张生产的重要基地。清初以来,夹江县造纸业迅速发展,虽然从业人口多,人均耕地不足,但治安良好,人民安居乐业,社会井然有序。在《以竹为生》中,艾氏通过口述资料,用三章的篇幅论述了围绕造纸术建构的社会经济秩序。

竹纸制作工艺十分复杂,分工精细,具有性别、代际分工等特点。通常情况下,生产一批纸张有 72 道工序,需要 3 个以上的劳动力消耗大半年的时间,关键时另需两三个帮工才能完成。男人们一生下来就有传承造纸术和接受宗亲训

练的资格,女人们则排除在一些技能的训练之外。年轻力壮的男人往往会选择收入可观的抄纸工作,也只有他们能胜任高强度的劳动负荷,即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,还得经得起长期浸泡和冬寒夏热的环境,女性和老人则负责劳动强度低得多的刷纸工作。不过,培养一个出色的抄纸匠非常困难,需要父辈、师傅对年轻男子进行不断的鞭打和责骂,让学习带上疼痛的触感,将技艺永久地嵌入身体。造纸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人们会采取娶媳或童养媳、领养儿子、招赘女婿及必要时雇工等方式进行补充,但在邻里和亲戚之间,往往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换工来共渡难关。这种具有互助性质且频繁发生的换工是地方秩序建构的社会基础。

家庭作坊是夹江竹纸生产的基本单位,开设作坊的家庭称为槽户,亦作造纸之家。虽然槽户的屋舍散落在山坡或悬崖之上,但造纸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。发达的宗族组织控制着每个宗族成员,宗族领袖通过一年一度的“清明会”聚集族人、祭祀祖先,分享造纸技能,并惩罚不守规矩的族人。密集的宗教网络覆盖了几乎所有造纸村落,形成了以东岳寺的香灯会、蔡伦会为中心的两大体系。在每年东岳寺庙会期间,富商们为获取社会权威而积极倡办公益活动,祭祀行业神蔡伦的庙会则是造纸大户与纸商谈生意的大好时机。原由走私商

[基金项目]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(2017CDJSK47YJ03)。

[收稿日期]2017-06-10

• 100 •

贩和运输工人组成的袍哥会,在民国年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。据说有 1/5 的人口参与其中,包括大量的官员、军人、商人,还形成了“清水”(合法)和“浑水”(非法)两个派别,其领袖人物均是地方权力网络中的重要角色,能够处理各种暴力事件。

夹江县造纸格局被青衣江分成两类,河东以平原为主,造纸作坊规模较大,故槽户称为“大户”。大户雇佣工人生产,所造纸张的质量较高。河西以山地为主,造纸作坊规模较小,故槽户称为“小户”。小户依靠家庭劳动力生产,所造纸张的质量较差,造纸仅是他们的家庭副业。夹江的大户与小户关系密切,大户经常义务地将造纸设备、原料和资金借给小户使用,小户则将纸张托付给大户销售,二者相互信任,很少出现诈骗行为。纸张的外销掌握在本地纸商之手,大纸商雇佣纸贩子到乡村收购纸张,汇于集镇和县城的纸铺,再运往附近的县市,乃至成都、重庆、泸州、昆明等地出售。纸商时常以造纸原料的形式提供低息贷款,帮助陷入困境的槽户度过难关。造纸大户与大纸商之间建立了长期、稳定的互惠关系,小户则与小商贩打交道,进行没有人情关系的短期交易。

总之,在夹江县,造纸技能是内化于造纸人身体的知识,并延展于物质性、社会性和符号性的环境之中。围绕造纸术及其再生产而形成的宗族、宗教和秘密会社等社会组织,构筑了造纸人群相互间的义务网络和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,他们彼此关联,组成了一个庞大的“实践共同体”。通过纸张的销售网络,夹江县又整合到全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,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。

二、大历史与日常生活

对于历史学家来说,造纸术也是一个历史性范畴,通过它可以观察大历史与造纸人群的关系。《以竹为生》的主要篇幅就是论述 20 世纪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史。

清末民初,因四川地区施行新政和军阀混战,民众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,但针对造纸业的“架槽税”,由槽户的大规模抗议而废除,故对造纸地区影响不大。国民革命之后,随着杂志

业和报业的兴起,纸张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,夹江县的造纸业进入了黄金时代,造纸人口剧增、纸张产量成倍增长,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,槽户更新造纸术,购买新机器,生产新闻纸等多种品种,供应市场需求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新政府立即强力介入纸张的生产活动和销售市场,极大地改变了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动。1950 年,中共控制四川西南,政府实行“以粮换纸”的政策,迅速管控造纸业。在土改运动中,大户被划成地主或富农,小户和造纸工则被分为中农或贫农,仅有少量抄纸工成为手工业工人——代价是失去分割“地主”财产的资格。1953 年,在农会的带领下,雇工和贫农自愿成立互助组,随即改成手工业合作社、工农混合社,后改建为国有造纸工厂。结果,只有具备工人成分的抄纸工仍在工厂造纸,其他人等大部分加入了人民公社。国有造纸工厂提高了工人待遇,大部分造纸人的生活水平也略有改观。对小槽户和造纸工人而言,生产纸张的劳动并无变化,仅是将分散的劳作集中到一个屋檐下。但是,在一系列的集体化运动后,造纸作坊的产权形态发生变化,打破了槽户、纸商间相互关联的义务网络。

不久,夹江造纸业进入了连续遭受打击的时期。“大跃进”之初,由于造纸人比普通农民理智,虽因应付时势打出了提高生产的口号,实际生产却未受影响。当“大跃进”的后果——粮食普遍减产的问题日渐显现,四川地区出现的大规模饥荒蔓延到夹江县。除国有工厂的工人外,其他造纸人不得自行谋生。随着饥荒的加剧,人们无奈把造纸设备拿去换食物,将竹林连根拔起,改种玉米和红薯,结果还是失去了 1/3 左右的造纸人口。1961 年,一些造纸出身的公社干部通过增加粮食供应和提高纸张价格等方式,让造纸人获得基本口粮,纸张生产也一度恢复。紧接着,国家推行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,不再向造纸人供应粮食,于是又出现了大规模挖竹根、种粮食的现象。夹江的造纸业因此跌至谷底,全县造纸人口仅有千余之数。

改革开放,造纸作坊恢复经营,纸张生产全面机械化。在县工业局的指导下,作坊主更新了造纸技术和设备,缺乏资金的可向农村信用

合作社贷款。在 80 年代,受“分田到户”政策的影响,共有造纸设备的几个家庭重新组成了新的生产单位,传统的互助和换工方式一度得到恢复,所产纸张交给个体纸商以游击贸易的方式出售。90 年代后,夹江的造纸步入正轨,作坊集中生产,销售市场化,贸易网络遍及全国各地,以致造纸工厂和作坊数量日渐减少,原属共享资源的造纸术(制作纸浆的配方除外)因新技能的传入而成为纸厂老板的秘术,厂房也被围墙与民居隔开。

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,夹江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摆脱了传统的束缚,少数妇女在家庭作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但宗族和宗教组织完全解散,传统的行为规范荡然不存。不止如此,造纸业失去了夹江县经济核心的地位,造纸术不再是人们的公共资源,传统生产互助、借贷互信的义务网络亦消声匿迹。

三、技术与国家

传统时代,造纸术是夹江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因素,造纸业则是夹江县的中心产业。不过,《以竹为生》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造纸社会的结构过程,而是其解构过程,即“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”,如何“将历史上发展而来的结构夷为平地”(页 230)。

确切地说,国家通过“去技能化”和“去工业化”等政策,将造纸术和造纸业的地位逐渐边缘化,从而瓦解了围绕造纸术的社会经济秩序。“去技能化”,是指将造纸技能从造纸人的意识中抽离出来,让造纸人变成普通的工人。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先后将传统的造纸术定性为落后的技术,造纸业则是散漫的手工业。为提高生产效率,政府试图通过先进技术来改良和取代传统的造纸术和生产分工,将复杂的造纸技术简化成操作片段,让造纸人无需掌握纸张生产的主要工序,成为没有技能、仅需重复劳动的工人。由于实际困难、纸张需求大和新中国“自力更生”的不投入政策,造纸作坊长期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,技术更新有限,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它的政治运动中,仍有不少槽户私

下从事纸张生产。改革开放后,由于机械化的实现,造纸术逐渐成为少数作坊主的秘术,造纸人才完成了“去技能化”。

“去工业化”,也称“去产业化”,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造纸人口的数量和弱化造纸业的经济地位。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迅速控制了造纸人口和造纸业。一方面,通过控制纸张的销售市场和粮食供应,让造纸人接受国家供给的粮食,按政府命令组织生产;另一方面,通过划分阶级成分,将大部分造纸人口划为农民,强迫他们种植粮食,仅有为数不多的工人能在国有工厂里从事造纸活动。起初,粮食供应充足,黑市纸张交易频仍,传统的家庭作坊尚能维持。随着大规模饥荒和自给自足政策的到来,人们不惜砍伐竹林,挖起竹根,经营家庭作坊的槽户再也无法组织纸张生产。由于造纸人口和原料供应不足,造纸业不断衰弱,最终成为地方经济的边缘行业。吊诡的是,夹江县的“去技能化”和“去工业化”看似相互促进,实际上政府对造纸人的“去技能化”是为了实现工业化,只因政治运动造成的市场失效和粮食危机,变成了“去工业化”。

通过对 20 世纪夹江县造纸人群日常生活史的全景论述,《以竹为生》揭示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过程,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。更为重要的是,《以竹为生》所揭示的问题,不仅是夹江县,也是其他造纸地区,甚至是全国传统手工业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。《以竹为生》能够获得美国“列文森奖”(2011),足已证明它是一部可以传世的佳作,但难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。如本书详述了夹江地区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,却没有论述这一结构的形成过程和内部机制,我们也不清楚夹江的宗族、宗教、秘密会社等社会组织有何特点。又如全书细述了传统造纸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过程,却未论及新的社会秩序如何建构,以致夹江地区依然治安良好,社会井然有序。这些也许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。